

“我”注唐诗

胜在真情 无关逻辑

■胡中行



▲庐山瀑布云

望庐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读李白的这首诗，文字疏解上须要注意两点，一是首句，太阳照在香炉峰上，紫气腾升，确是妙景。问题是庐山共有四座香炉峰，李白咏的是哪座“香炉”？

这个问题网上一搜便得，却是不能忽略这个举手之劳的。李白所咏之“香炉”，当在庐山山南秀峰寺(古名开先寺)的后面，称南香炉峰。二是关于“三千尺”，“三”是古汉语中最常见的概数，通常不是确指。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必须理解成“几个人”的。我们要感谢李白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美仑美奂的图画，给予我们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李白写景诗的欣赏，使我们领略祖国的山水之美，从而激

游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唐人孟郊的这首诗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它写出了人类最伟大的情感：母爱。母爱是无处不在、细致入微的。所以诗人随手撷取了游子将行，慈母为他缝制衣服的片断场景，便能引发共鸣，

发起爱国热，令人动容。在这里无须说教，每个人都能读懂其中的真情所在。有一点须要说明的是，诗中公认写得最好的一联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而从逻辑上说，两句在意思上其实并无关联，既不构成因果，也不构成递进，甚至不是并列。翻译一下，衣服针脚细密，怕他迟迟不归。显然有着逻辑问题。那么它到底好在哪里呢？我认为好就好在真情两字。孩子出门，母亲的心情是五味杂陈，本来就不能用逻辑来进行梳理的。把衣服做得好一点让孩子穿得舒服，和希望他早早归来，这两种似不相关的动作与想法，却是统一在对孩子的挚爱深情之中。所以令人感动。我的体会是，真情实意是不需要逻辑的。

杜甫并不以五绝见长，但这首八阵图却是上乘之作。这首诗好就好在极具历史的沧桑感和凝重感，我甚至认为，咏史诗就应该是这样写的。八阵图相传是一种御敌的阵法，历史上只有几位顶尖的军事家如姜尚、孙子、韩信、诸葛亮、李靖才会使用。诸葛亮布此阵的遗址有多处，但大都只是传说而已。关于这首诗的一桩公案是必须了解的。请大家读一段苏轼《东坡志林》中的文字：仆(我)尝(曾)梦见人云(说)是杜子美，谓仆曰：“世人多误解吾诗《八阵图诗》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人皆以为，先主(刘备)武侯(诸葛亮)皆欲与关羽复雠，故恨(遗憾)其不能灭吴。非也！我本意(原意)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为敌)。晋(司马氏)之所以能取蜀者，以(因为)蜀有吞吴之意。此为恨耳。”此理甚长。

八阵图

杜甫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上接第一版)

陈原是出版界出名的演讲者，从1977年到2001年，他在各种场合发表各类演讲难以细数。其演讲有工作报告、学术报告、知识讲座等，涉及主题有语言学、编辑出版和辞书编纂、世界语。他的多部著作皆由演讲稿集结而成。《社会语言学论丛》收录了1981—1986年演讲记录和报告提纲；《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是1988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之约给社会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做的系列演讲；《语言和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社会语言学的演讲；《变异与应变》是1991年在香港作的语文教育讲座，《总编辑断想》是1993年应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李祖泽总裁之邀给出版机构“老总”作的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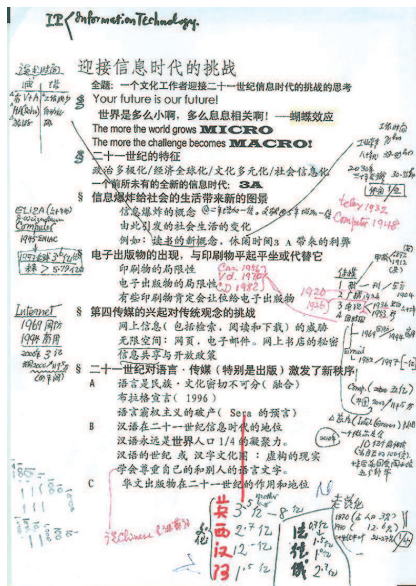
从时长来说，陈原最著名的一次报告长达七个小时。1977年11月，他代表国家出版局《辞源》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在长沙举行的《辞源》修订协作会上，对辞书界受到的钳制作了彻底的清算，提出了辞书编纂工作拨乱反正的要求，这一讲话在出版界和辞书界广为传播。而内容精彩、信息量大的报告，当推1979年7月陈原访英归来，受代表团委托在北京举办500多人参加的大型报告《访英观感》，他在报告中传播的异域思潮和开放之声，醒人耳目，发人思索，多家媒体刊载，2004年《出版史料》杂志在陈原去世之际重新刊发，以示纪念。

因为陈原在出版界、语言学界和世界语界的领导者身份，多次出国考察，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如1981年率领中国作家翻译家代表团访美，1984年参加莫斯科国际书展，1984年参加第二十二届国际出版家大会，考察加拿大术语信息库。他回国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作学术报告或专题演讲，参与并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历程。而关于语言与社会生活、语言的污染与净化、编辑的自我修养等主题报告，都是产生持续影响力的演讲。1998年新闻出版署组织陈原八十诞辰报告会，他别开生面地做了“迎

接信息时代的挑战”演讲，《光明日报》予以报道：“他的报告和他，是一个示范：一个高层次出版工作者应如何不断追求、创新，活到老，学到老，永葆学术青春。”2000年7月，陈原只身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参加国际第八十五届世界语大会，回来后在商务印书馆作“圆梦”为主题的演讲，大受青年人欢迎。

陈原的演讲不仅内容新鲜，而且他率先借鉴西方学术报告活泼轻松的方式，“讲一小时，提问一小时的‘洋’习惯”，提倡废弃填鸭式报告。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出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版权问题五花八门，陈原应邀举办版权知识讲座，当场收到50多个提问的字条，他深入浅出地作出解答，对症下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出版工作》杂志将这些问题和解答分期刊登，便于更多的出版工作者学习借鉴。

演讲的魅力在于现场感和参与感。陈原1997年在香港作有关张元济的演讲时，提到他最佩服的两篇演讲，一是鲁迅1927年7月23日在广州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是周谷城1988年5月4日在北大讲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他说这两篇演讲都把人讲活了——讲者和被讲者，好像都在你眼前。他认为，演讲不像写文章，要讲得实实在在，还要风趣，把讲的人自己也嵌到里面去，这样才能让听众获得印象，至少不会打瞌睡。要达到那样的程度——全局在胸，人物和事件通通烂熟，加上自己的实感和推断，把人讲话，就很不不容易做到。有此感悟，他在演讲或报告中做到旁征博引，言中有物。1980年他作为《汉语大词典》的学术顾问先后作三次报告，尤其是闭幕式上，“先讲一段官话，然后讲一段空话，最后再讲一段废话”，贴近现实，生动风趣，警句频出。出版史家方厚枢回忆，那次报告“在半个小时内就获得全场人员八次大笑和热烈鼓掌，会场的气氛十分活跃”。程三国回忆，他1997年6月有幸在上海听过陈原关于“中国出版：传统与现代化”学术演讲，“从来没有见过陈原老这么有风



▲陈原演讲手稿

度的老人，站着，脚那么交叉着。他讲当年张元济怎么经营，他怎么经营”。

视陈原为“启蒙导师”的陈万雄回忆，他1980年进入出版界听到的第一次演讲，就是陈原的访港演讲，这次演讲开阔了他对出版的认识，也是与陈老成为忘年交之始。1980年6月底，陈原率领出版代表团到香港考察访问，是1978年后第一个访港的代表团，陈原在香港美丽华大酒店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作了一小时演讲，到会者有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界人士数百人，极一时之盛。陈万雄说这是他个人体验到的一场少见的精彩演讲：“充实的内容，丰富的学识，恳切诚挚而不亢不卑的态度，幽默动人的讲演才能，不仅令招待会很成功，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内地与香港一次文化交流的‘破冰之旅’，也是其后陈原老与香港文化学术界长期惺惺相惜的开始。”曾任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赵斌表示，他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陈原关于编制长期出书规划的讲话后非常震撼，从此“知道了应该怎样当总编辑”，深深地影响他以后做出版工作的价值观。

在潘耀明印象中，陈原先生来香港讲学时已是耄耋之龄的人了，但精神矍铄，步履轻快，笑声爽朗，生理状况及心理状态都很健旺，一点看不到老人征状。此言非虚。陈原1997年10月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百年馆庆举办的“21世纪资讯时代的文化与社会”系列学术讲座上，作了《中国语言文字面向21世纪》的演讲。做系列演讲的还有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丘成桐，主讲中国数学在21世纪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高锟教授主讲物理学，何炳棣教授主讲中国历史，都得到香港教育文化界和新闻出版界的积极反应。陈原能在普通话和粤语、英语之间自由转换，古典广东音加普通话词汇，令听众呼为“粤语的活化石”。

作为语言学家，陈原从语言与信息的关系来理解演讲的“信息反馈”意义。他说，发表文章只能是单向的信息流，而演讲却是双向的信息活动。听众的表情和眼神，听众的掌声，听众的厌倦，听众的笑声或窃窃私语，甚至使报告人多少感到困惑的提问，所有从听众发出的声音、姿态和语言，都是非常有益、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信息反馈。因此，他演讲时总能与听众建立一个独特的“场”，令大家屏息静坐，讲者与听者从容对接，在反馈交流中享受其独特经验。经常听陈原用世界语做报告的中华世界语协会原会长谭秀珠撰文说，陈原的世界语表达像母语一样自如，他的语言幽默机智，不是照本宣科，“从他回答听众问题，与听众的互动中看到他的博学和驾驭语言的能力，他能吸引全场的注意力和能使严肃的学术讨论变得异常活跃和轻松”。

陈原最后一次演讲，是2001年9月4日在商务印书馆作的“《辞源》三主编”报告，借悼念8月6日去世的黄秋耘，追怀刘叶秋、吴泽炎和黄秋耘三位主编修订《辞源》的巨大贡献。但这样一位能言善辩的老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光却饱受不能言语之苦，思之令人唏嘘不已。

睹印思人，忽然想起有人说，声音随风飘逝，文字寿于金石。其然乎？岂其然乎？